

桐城



文章法的总结与超越

廣州文化出版社

中华文学遗产
新论丛书

何天杰著

桐城文派：
文章法的总结与超越

何天杰 著

廣州文化出版社

责任编辑 文 政
封面设计 韦求真 吴兆铭

桐城文派：
文章法的总结与超越

何天杰 著

•

广州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发行

(广州市东风中路503号7楼)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6.5印张 12万字

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册

ISBN 7-5431-0128-9

I·55 定价：2.60 元

内 容 提 要

桐城文派是一个曾经煊赫一时、风靡全国的散文流派,先后麇集了数以百计的散文作家,创造与丰富了“桐城家法”,总结和发展了我国古代的散文理论,留下了不少传世之作。可是,自“五四运动”时期,桐城文派被斥为“桐城谬种”之后,这一文派渐渐被遗忘了。本书作者研究了桐城文派的形成及其发展,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其主要作家、作品,以及散文理论进行了比较深刻的分析,不少属有识的新见,有助于读者对桐城文派的了解。

本书是《中华文学遗产新论丛书》之一。

《中华文学遗产新论丛书》编辑说明

上起先秦，下迄清末，数千年来祖国的文学遗产源远流长，传统深厚，为世人所瞩目和推崇。

对于这份丰富多采的文学遗产，应当如何学习与研究呢？问题似乎有“老生常谈”之嫌。不过，无论“反传统”也罢，“寻根”也罢，作为一个炎黄子孙，总有继承文学遗产精华的责任。而且，近年来倡行实事求是之风，思想活跃，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新见迭出。于是，我们萌发了编撰一套古典文学知识丛书的念头，并据其功能定名曰：《中华文学遗产新论丛书》。

《中华文学遗产新论丛书》突出体现作者研究的新方法、新观念、新角度、新结论，区别于以往的古典文学知识丛书。丛书的另一特点，是以古典文学的文体分类：诗经、庄周散文、楚辞、汉赋、乐府、六朝骈文、志怪传奇、唐诗、唐宋古文、宋词、元曲、晚明小品、明清白话小说、桐城文派、古代文论凡十五种。分别选取各种文体在文学发展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时期与作品进行剖析，揭示其历史流变及价值。每册一般不超过十二万字，并附有资料性的表格。行文

力求说理简明，重点突出，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总之，尽力提供更多新鲜的信息，帮助读者学习和研究，使我国文学遗产的优良传统得以发扬光大。

在编撰这套丛书过程中，我们聘请俞汝捷、刘斯翰二位先生为特约编辑，并得到湖北、广东、北京、广西等地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鸣谢！

文政

一九八七年九月廿五日

目 录

引言.....	(1)
深埋于历史尘土中的桐城文派 桐城文派的源流与分期	
旧传统维护者的悲剧及对此再认识的必要	
第一章 在载道与崇文的两难选择中.....	(12)
散文理论的艰难起步 尚用观念下的汉人创作与理论	
六朝唯美的创作与形式主义文论 复古的唐宋文论	
形式主义再次高扬的明代文论	
第二章 桐城第一法	
——方苞(上).....	(24)
“言有物”的实质与时代成因 “言有物”的途径：人格	
与文章的统一 桐城文派：在道德自律下形成的职业文人	
团体 做人先于为文的利弊	
第三章 桐城第一法	
——方苞(下).....	(40)
以记叙文为对象的“言有序” 人事相称、常事不书等	

史学原则的文学化 唐宋派脉理精神理论的发展 雅洁风格

第四章 “叛逆者”的开拓之功

——刘大櫟 (57)

不合标准的接班人对桐城家法的形式主义改造 神气与“活法” 在古代诗论与文论交叉点上产生的“因声求气”说 以诗论说文的先行者之误

第五章 道与艺合 天与人一

——姚鼐 (74)

时代造就的理论建树 折衷文道的道与艺合 出儒入庄的天与人一 文学散文与非文学散文本本质区别的发现 由方苞的简淡与刘大櫟的任情融会而成的“神韵”

第六章 全盛时代及其危机

——姚门弟子 (94)

兼容并蓄的姚鼐与各有所长的弟子 切磋竞争之风带来的创作兴盛 继往开来的关键人物梅曾亮 细节描写与真实感情 力不从心的“文章因时”

第七章 从桐城到湘乡

——曾国藩 (112)

雄肆之风 合“有所法”与“有所变”于一身的曾国藩 纪实散文的先驱者 深识高见与爽直明快 咫尺万里的结构法 谈说之趣

第八章 马背上的文士们

——曾门弟子 (132)

薛福成的《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 变法图强的主旋律

雅健敏才主张中流露出来的伤感 曾国藩闲适之趣的

实现 立功立言两彷徨

第九章 桐城末路人

——林纾 (152)

萎缩中的桐城文派 曲折的一生与鲠直多愁的性格

赤诚的爱国热忱 儿女真情的大胆描写 含蓄缠绵

的抒情方式 末路之叹导演下的时代悲剧

余论 (172)

晚辈学人对桐城文派的缅怀 桐城文人的努力规定了
现代文学散文的发展方向 历史与借鉴

附录 桐城文派年表 (182)

引 言

我们民族的古老文化，象原始森林中萌生于洪荒时代的古木身上的年轮，一圈一圈；象长江大河入海处的冲积洲上不断淤积下来的沃土，一层一层。

面对着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犹如抚摸古木横截面上那与逝去的岁月相平行的年轮，犹如观察刚从钻机上取下的显示地层变化的岩芯，常常会使人怦然心动，使人激情难已……

在这本小书里，我们将向大家介绍清代的“桐城文派”。这个文派的名字，对于不少读者来说，可能会是非常陌生的。大概，人们对它的了解，还远远不及对唐诗、宋词，对关汉卿和曹雪芹那么熟悉。尽管这个文学流派的销声匿迹，距今不过半个世纪多一些，但是，它在人们心目中勾起的遥远感，还有神秘感，却并不亚于那些锈绿斑驳的商周彝器、那些栩栩如生的秦陵陶俑——历史有时真是冷峻到令人难以理解和置信！

桐城文派是一个曾经煊赫一时、风靡全国的散文流派，它在历史上留下的兴盛衰亡的痕迹，几乎与清王朝的建立坍塌相重叠。在桐城文派的旗帜下，先后麀集过数以百计的散

文作家，他们有的陈陈相因，仅仅藉结派而自高，也有人在创造、丰富“桐城家法”。总的来说，桐城文派的作家们总结、发展了我国古代的散文理论，也留下了不少传世之作。在长达二千余年的中国古典文学的长河中，就流派而言，其亘绵时间之久、所属作家之多、影响熏染之广之深，或许只有宋代的江西诗派才能与之相提并论。既然如此，桐城文派的忽然灰飞烟灭，似乎是不大公平的，其中必然包蕴着深刻的道理。要理解这个道理，还是让我们对桐城文派的整个历史作一次鸟瞰式的浏览吧！

桐城，位于安徽省西南部的叠叠群山之中。县境之内翠峰逶迤，林壑幽深，绿水萦回，风景奇伟而又秀丽。桐城文派的几位创始者，便先后降生在这块土地上。正因为如此，尽管后来参加这个文派的作家多数已不是桐城人，服膺其创作理论、学习其创作风格的作家几乎遍布于半个中国，但人们还是把这个文派称为桐城派。

然而，难以思议的是，桐城文派的得名，竟是出于一句戏言。那是乾隆三十七（1772）年的事。乾隆皇帝下诏开《四库全书》馆，开始编纂有史以来最大的丛书。当时任刑部郎中的姚鼐受到大臣举荐，入馆为纂修官。这时，馆中非翰林出身的纂修官才八人，四十刚出头的姚鼐因积学能文而荣膺此选，自然十分得意。在馆中，姚鼐的同事程晋芳、周永年曾对他讲：

写文章的，要有所效法之后才能文，又要有所变化才能发展。清代的统治之隆盛超越前代千百倍，只是士子中擅长古文写作的人还不多。过去有方苞侍郎，现在又有刘大櫆先

生，天下文章，大概都出于桐城吧！

程晋芳祖籍安徽歙县，他又曾师事刘大櫟，说这种话还不足为怪；而周永年是山东历城人，史称他平生好学、喜藏书、学识渊博而又从不著述，偶有写作亦不存稿，这样一位与桐城文章关系甚远而又秉性古怪的读书人的意见，倒是极应重视的。它至少说明了，在周永年活动的时代，桐城文派的形成，以及它得到众多文人的倾心与归附，是一个明明白白的事实。现在，让我们回过头去，从桐城文派的始祖开始说起吧！

桐城文派的先驱者是戴名世，他是桐城人，也是方苞的年辈稍长的挚友。戴名世为人崇尚气节，以精、气、神三者合一论文，为文主张平易轻淡，去粉饰，少限制，顺应自然，这些都可视作为方苞、刘大櫟、姚鼐主张的先声。但是，戴名世恃才狂放，好使气骂人，所以，他的文章往往锋芒毕露，感慨忿懣，与桐城文家“雅洁”的主张相去甚远。他晚年时曾告诉方苞：“我现在才懂得优柔平和，允执厥中，是文章兴盛的标志，只有那些有道者才有可能接近于此，我心中欣慕但还做不到”，对自己的过去表示了悔恨。戴名世大半辈子以教书、做幕宾维生，自甘贫贱，还在桐城购田买宅，打算终老是乡。但是，因为家人不谙生产，族人又多方欺凌，戴名世终于在五十岁之后改弦易辙，重入科举之途。他五十三岁中举，五十七岁以第一甲第二名考上进士。方苞对他不耐寂寞甚为不解，多次劝告他放弃声利，归隐家乡。但是，戴名世却没有听从，终因《南山集》中屡称南明弘光、隆武、永历年号，触犯时忌，为人参奏，下狱处死，他的著作也遭到禁毁。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桐城后学都不敢也不便提

起他的名字。直到道光、咸丰之交，姚鼐的再传弟子方宗诚、戴钧衡才重新肯定他在桐城文派中的地位。

桐城文派的奠基者是方苞。他的祖父做过清朝的学官，而父亲却喜欢与当时著名的逸民诗人杜浚、杜垓、钱澄之等人诗歌往还，以遗逸名。前辈的以气节相尚，给青少年时代的方苞以巨大的影响，决定了他的人生追求。方苞自幼在祖父、父亲以及长兄的指导和督促下学习经史古文。二十四岁初游京城，李光地见其文，感叹说：“真象韩愈、欧阳修再生，北宋以后就没有这样的作品了”，韩葵则称赞他的文章“欧阳修达不到这么深厚，曾巩没有这般雄直，难道不是韩愈之后的第一人么”！名公巨宦的赞誉，使方苞文名鹊起，倾动一时。在此以后的一段时日中，方苞的思想和文章风格渐趋定型，他不仅在创作理论上提出了“义法说”，而且文章风格也由少年时代的雄放转向醇厚雅洁。据他的挚友戴名世的观察——

始灵皋（方苞）少时，才思横逸，其奇杰卓犖（卓绝出众）之气，发扬蹈厉（意气风发），纵横驰骋，莫可涯涘（难穷其边际）。已而自谓弗善也，于是收敛其才气，浚发（疏导）其心思，一以阐明义理为主，而旁及于人情物态，雕刻炉锤，穷极幽渺，一时作者未之或及也。（《方灵皋稿序》）

这样，桐城文派的理论基础及其创作风格，便都由方苞规定了。

方苞到晚年时已成一代文宗，他门下的弟子，有名的有雷铨、沈彤、王又朴、沈庭芳、王兆符、程峯等人，而成就

最高的，则是刘大櫟。刘大櫟少即能文，他十三岁时所做的《观化》一文，被《国史·文苑传》称作“奇诡似《庄子》”而赞不绝口。二十九岁，刘大櫟入京应试，深得方苞的揄扬：“象我方某人，哪里算得了什么，我的小同乡刘生，才算得上国士呵！”——真是一言九鼎！年近六十的当世文宗，对初出茅庐的刘大櫟的夸奖，使他一夜之间成为誉满京华的风云人物。可是，自此以后，在方苞思想的影响下，刘大櫟气肆才雄、波澜壮阔的文风渐次收敛。当然，刘大櫟毕竟终生落魄科场，无论是乡试，还是博学鸿词科、经学科，他总是落第，于是，只好以自幼熟读的《庄子》来自慰，等穷达、齐贫富之说时见于其文，更有不少抒愤骂世之作，不仅思想上不“醇”，连文风亦徘徊彷徨于雅洁与放纵之间。因此，桐城文派的一些后学（比如曾国藩）就力图把他摒除出文派之外。不过，由于刘大櫟受庄子思想与文风影响较深，不象方苞那么拘谨，显得较有艺术眼光，所以他得以嘉惠启迪后学的，也不仅仅局限于方苞的“义法”之说；兼之刘大櫟的创作中诗赋古文，并行不废，因此，他不仅把方苞的衣钵传给了姚鼐、王灼、吴定、程晋芳、朱孝纯、金榜、江浚源等人，还通过另一弟子钱伯垌的宣传，得到了素习骈文与辞赋的恽敬、张惠言、李兆洛等人的尊崇。恽敬等人后来创立了一个桐城支派——阳湖派。阳湖诸子的散文重文采、少拘束，从中不难发现刘大櫟文风的影子。

姚鼐是桐城文派得以形成的关键人物。姚鼐自小随伯父姚范读经，从刘大櫟学文。从思想感情而言，或许他更亲近于刘大櫟，幼年时的姚鼐甚至还装扮成刘大櫟的模样，模仿着他的音容笑貌以为游戏呢！后来，年近五十的姚鼐在回忆

起孩提时代的趣事，依旧不胜依恋。而姚鼐对刘大櫟的亲
近，决定了他日后将主要地成为一个文学家，而不是经学
家。在科场上，姚鼐远较刘大櫟幸运，三十出头便进士及
第，顺利地步入仕途。可是，他在四十四岁的壮年，而且是
仕途顺遂的时候，突然辞官告归，回到江南。当时的大学士
梁国治曾托人传语姚鼐，答应在他复出时向皇帝“特荐”，让
他得到破格提拔，姚鼐还是婉言谢绝了。姚鼐退出官场的表
面原因是他与《四库全书》馆的主持者以及同僚议事不合，无
法容忍他们对宋明理学的訾谤。然而，姚鼐的学生姚莹所作
的《从祖惜抱先生行状》中则称姚鼐“少时家贫，体弱多病，
而嗜学，淡荣利，有超然之志”，后来虽然“蔬食或不给，意
淡如也”，那么，姚鼐的急流勇退，或许更应该从他的性格
和嗜好中寻找答案了。这种性格对姚鼐把握对中国文学有
深刻影响的庄子之说，极有帮助，因此，他把庄子的艺术
论、审美观融进了以儒学为主体的桐城散文理论。在他之
前，戴名世的遵循自然的主张，方苞的“无意作文，才能到
达至境”之论，刘大櫟雄放恣肆的文风，实际上都代表着散文
领域融庄入儒的尝试。但是，戴、方、刘基本上都是儒家信
徒，意识上“攻乎异端”的态度，注定他们的努力只能学到一
点皮毛。而姚鼐对于庄子之说，还有佛学、考据学都较为通
脱，敢于吸取，“道本艺末”的传统观念和推崇文学两者之间的
矛盾，被他以“道与艺合，天与人一”的主张调和了，道德
论与艺术论在新的起点上取得了平衡。姚鼐在理论上的建
树，他的熔义理、考据、文章于一炉的创作，再加上他对后
学的谆谆善诱、奖掖劝勉，这些，大大地增加了桐城散文的
影响，桐城文派正式形成了。

在姚鼐的学生中，最出名的是人们习称的姚门四弟子。至于四弟子究竟包括谁，那就诸说纷纭了。曾国藩认为是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和姚莹，王先谦则力主以刘开替下姚莹，有人则干脆折衷旧说，提出姚门五弟子，总之，这场官司至今还未打完。除了上述五人外，陈用光、姚椿、毛岳生、吴德旋等人，也是姚鼐门徒中的佼佼者。姚鼐的学生们生活在社会巨变的前夜，有的还亲眼目睹列强入侵，“天朝上国”是如何在“夷人”面前威风扫地的。这使他们模模糊糊地感觉到“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时”的必要，但是，他们毕竟是在表面繁华安定的乾嘉盛世里成长起来的，因袭的包袱，使他们无力在理论和创作中找到一条完全适应于社会变革之路。因此，尽管在姚门弟子活动的时日里，服膺桐城文法的作家之众，远非他们的先师方、刘、姚在世时所可比拟，连广西、湖南、江西、山西等地都有人来请教作文之法，但是，桐城文派的活力及影响，反倒如同昔日黄花，日见其萎。

如果要为桐城文派的发展划分时期的话，那么，从戴名世到姚门弟子，可算桐城文派的前期。这一时期里，桐城文派从酝酿、筹备到正式成立，然后是在师徒授受之中风靡一时；桐城文论亦由奠基而不断发展、完善。然而，从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桐城文派的队伍中，发展、变化是局部的、次要的，而继承因袭则是本质的、重要的，包容性远远超过了突破性，早已能文，而且文章风格与“雅驯”有较大距离的刘大櫆、梅曾亮都先后皈依了桐城派，而且成了桐城文派中承前启后的大师，就是明白不过的证据。这一时期桐城文派基本延续着的雅洁平淡的文风，也是与大致保持着平静繁华表象的社会生活相适应的。

能在时代巨变中补充、修正桐城文论的是曾国藩。他以“经济”（经世济民）来补充姚鼐的“义理、考据、文章”，来解决梅曾亮虽然提出、却无法完成的“文章因时”的任务。曾国藩把渐渐与社会、与政治隔膜的桐城散文重新拉向现实，他需要用散文为自己的杀伐事业摇旗呐喊。尽管曾国藩的杀伐事业是血淋淋的，尽管在政治史上他已经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他在散文史上的劳绩。他成功地把桐城先师们可望而不可即的雄肆阔丽之风呼唤进散文创作领域，从而使清淡简洁的桐城文风顿见改观；他开拓了散文创作的题材来源和表现范围；他扩大了学习前人的途径，他编选的《经史百家杂钞》补进了姚鼐的《古文辞类纂》所不收的儒家经籍、诸子散文、史传散文，他不因为汉赋的章法板滞便象方苞那样加以排弃，而是吸取了汉赋所长的恢阔气象。大概正因为如此，顾学颉称曾国藩是在“改弦更张”，称他“颇有点象李光弼代郭子仪而军”，令人有壁垒一新之感；有人还把曾国藩及其追随者所组成的即继承又发展桐城家法的集团称作“湘乡派”。

接下来便到曾门弟子了。曾国藩以卫道为号召，吸引招致了一大批在旧传统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文人，其中最受他赏识的，是“曾门四弟子”——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黎庶昌，此外，吴敏树、莫友芝、郭嵩焘、刘蓉等人，亦都以能文著称，他们把桐城文派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清末。曾门弟子面临着中国半殖民地化日益加深的严酷现实，他们又程度不同地参与了洋务运动，因此，他们的散文创作中令人注目地增加了爱国御侮、变法图强的内容。从这点上说，他们倒是与主张“通经致用”的龚自珍、魏源等人在思想上是一脉相承